

# 北魏常爽学馆性质考

滑 裕 楼 劲\*

〔摘 要〕 北魏常爽学馆历来多被视为私家学馆,其馆规模甚大,招收众多贵游子弟,且教学严厉。本文认为作为亡国之余的常爽,生计颇为艰难,在当时严令禁立私学的情势下,难以开办这样一家私人学馆。常爽学馆是在中书学已获得长足发展后,太武帝提振城东太学学业的产物,学馆所处位置也与太学相合,具有太学性质。西晋以降太学体制发生变动,南朝太学更是出现了诸馆并置的格局,馆主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性,常爽学馆很有可能是北魏当时的太学亦已数馆并置的体现。对常爽学馆性质的辨析,不仅可见北魏前期国学的演变过程,而且可以帮助理解有魏一代文教与政治特殊紧密的关联。

〔关键词〕 常爽学馆;太武帝兴学;北魏国学

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迁凉州士民入魏,其中不乏文学儒雅之士。河西士人在北魏的儒学振兴、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常爽即是其中的代表。<sup>①</sup>前人据《魏书·常爽传》认为其在平城所开学馆是一家私人学馆,将其视为北魏前期私学的典范<sup>②</sup>,却未意识到《常爽传》载其立学授徒之事存在着诸多问题,也留下了若干值得深入考虑的线索。以下即拟综诸记载讨论这些问题和线索,辨析常爽学馆并非私学而属太学的性质,以有助于对北魏前期国学体制变迁及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政策转折过程的研究。

## 一、常爽学馆难以视为私家学馆

太武帝平凉州,河西大族名士多被迁徙至平城,常爽亦是其中一员。《魏书·常爽传》载: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侯,《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

\*滑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100872;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732。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59页。

②学界目前尚未有专论常爽学馆的文章,只是在提及北魏的学校时有所涉及。教育史相关著作多将常爽学馆视为私家学馆,如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9—300页。一些研究北朝史或北魏史的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如宋冰《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学术交流》2006年第2期,第153—157页;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sup>①</sup>

常爽在温水之右开馆授徒，生徒达七百余人，其中多“贵游子弟”，且其“劝罚之科”有同严父，教学事业得到崔浩、高允赞许。前人据此认为常爽学馆是一所私家学馆，但若仔细辨析《常爽传》的内容，就能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

国破被徙的凉州士民，因才能资地之殊，在北魏的境遇也有所不同。除少数特例，多数人皆属“亡国之余”而身份低下。<sup>②</sup>常爽因“归款军门”受到太武帝嘉奖，拜六品宣威将军，但在百官无俸的情况下，常爽一家资生境遇不佳当可断言。胡叟之况即可为例，胡叟在太武帝平河西前主动归附北魏，拜五品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以酒自适。后被文成帝召至京师，因而留居平城，游走于诸胜贵之门，靠友人接济度日，妻子不免于饥寒。<sup>③</sup>常爽或因生计艰难而须开办学馆借以营生，但据《常爽传》所载，其馆规模甚大，生徒多为官贵子弟，显然是一所屋舍、设施众多，等级较高的学馆。在济辈大都贫困交加的情况下，常爽能否建起这样一所学馆，颇令人怀疑。

常爽既为六品宣威将军，实为官身，则其“讲肄经典二十余年”，若为私学，就多少显得有些奇怪。当时北魏的杂号将军亦类散秩，带其号者往往别授实职，在当时徙至平城的河西士人中，宗钦即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sup>④</sup>常爽与兄既属主动归款而被赐爵授衔，<sup>⑤</sup>常爽“博闻强识，明习纬侯，《五经》、百家多所研综”的知识结构，尤其合乎当时统治集团兼重儒学、术数的要求，诸如崔浩、高允等著名汉士，亦皆以学识博杂明于天文阴阳而为太武帝所重。<sup>⑥</sup>以此相衡，常爽带宣威将军之衔而另有实职的可能是不能排除的，从当时河西士人常被授予文教官职的状况来看<sup>⑦</sup>，此职倘为教职，爽以官身长期讲肄经典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从太平真君以来的法令规定看，常爽能在京师开馆“讲肄经典二十余年”，若为私家学馆是不可设想的。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3）正月庚戌诏曰：

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驽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sup>⑧</sup>

诏书以宣示文教，整齐风俗为意，振兴太学是具体措施之一。太武帝令王公至卿士子弟皆入太学，将其教育纳入朝廷的统一管理，是要改变鲜卑勋贵子弟不务学业而溺于积习的局面，而其所谓“整齐风俗”的举措之一，则是禁止私立学校，断绝身份卑微的技艺者混为儒生的可能，强制其只能世传其业。常爽所立倘为私馆并在京师讲习长达二十余年，则明显违背了禁立私学的法令。太武帝用法严急，虽

①《魏书》卷八四《常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8—1849页。

②凉州士民入北魏后的一般境况，见《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建传》附《元深传》，第430页；《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0页。

③参《魏书》卷五二《胡叟传》，第1149—1151页。

④《魏书》卷五二《宗钦传》，第1155页。

⑤河西士人入仕者，本传多以“爵位+将军号+官职”或“爵位+将军号”的方式书其官爵。据文成帝《南巡碑》所录官爵看，其时有爵位者通常都带将军号。《常爽传》仅载其兄仕国为五品显美男，未载将军号，史笔或有省略，对常爽而言恐亦如此。

⑥崔浩“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参《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07页。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参《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67页。

⑦如《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载其入国拜著作郎，第1158页；同卷《阴仲达传》载其除秘书著作郎，第1163页；卷九一《木艺·江式传》载其祖强擢拜中书博士，第1960页。

⑧《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97页。

“大臣犯法，无所宽假”<sup>①</sup>，常爽不但未遭处罚，反而受到崔浩、高允的称许，这已足证常爽学馆的性质绝非私学。况且北魏前期尚武之风甚盛，贵游子弟不免骄纵恃势，常爽授徒则“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更被视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的重要标志，就一所私家学馆而言，这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至平城的河西士人索敞，其教学事迹也与常爽颇为相似。《魏书·索敞传》载其敦煌人，曾为河西大儒刘昺助教而专心经籍：

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

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sup>②</sup>

索敞既为中书博士，其“笃勤训授”显然是在中书学。故其所教多京师贵游子弟，学生则敬惮其威严，学有所成仕宦通达者不在少数。这些与常爽授业之况惊人一致的事实，皆因中书学是国学，其教学活动受到朝廷法令和太武帝崇教兴学政策的保障。以此联系上述疑问，《常爽传》载其学馆在生徒来源、教学纪律和学成者出路等方面与《索敞传》所载的高度雷同，恐怕只能说明其馆性质与中书学相通，其规模、生源和教学纪律也须放到国学体系和当时的政策背景下才讲得通。

## 二、太武帝兴学与常爽学馆的性质

与《常爽传》述其开馆教学有成而“京师学业翕然复兴”之事相联系，《魏书·儒林传序》述道武帝以来立学之况，也提到过太武帝时“儒林转兴”之事：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426）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sup>③</sup>

《儒林传》意谓太武帝时“儒林转兴”的代表性事件，是中书学的继续发展和太学的复兴。中书学至迟在明元帝神瑞（414—415）年间已经设立<sup>④</sup>，此前明元帝至少当已着手规划改立中书学。他即位之初，命崔浩“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sup>⑤</sup>，永初五年（413）又下诏征“可为人师者”<sup>⑥</sup>，这些都应属改立中书学的相关举措。

神䴥四年（431）九月壬申，太武帝下诏征士，迎来了中书学的重大发展。《魏书·世祖纪上》载其事：

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儒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sup>⑦</sup>

太武帝诏书强调“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标志着其统治政策由武功转向文治。诏文中的“理废职，举逸民”及“延登俊乂”云云，皆包含了大兴文教的内涵。而卢玄、高允等为太武帝明诏所征，至平城者三十五人，皆拜中书博士。<sup>⑧</sup>晋末乱离以来，学术文化的地方化和家门化过程明显加速<sup>⑨</sup>，卢玄等人

①《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107页。

②《魏书》卷五二《索敞传》，第1162—1163页。校勘记据《北史》本传，认为“请”下脱“谥”字。

③《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第1841—1842页。

④神瑞（414—415）中李顺为中书博士，这是《魏书》所见最早的中书博士，则中书学之设至迟在神瑞年间。

⑤《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5页。

⑥《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2页。

⑦《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9页。

⑧《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34页。

⑨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7—148页。

多属各地代表性盛族，世传学业，他们出任中书学博士，迎来了中书学发展的高潮，遂被《儒林传序》视之为“儒林转兴”的象征之一。

神麴四年征诸儒士后，中书学的发展当已极为可观，《索敞传》所载正是其缩影。已于始光三年建立的城东太学则相形见绌，并无多少记载。太延五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改元“太平真君”，此名来自道教，意在强调太武帝为开辟太平盛世的受命之主，但当时对于太平盛世的意蕴，却仍主要是按儒经所示王者之治和汉魏以来的相关实践来塑造的。作为神州正朔所在和一代命世之主，自须尤重衣冠礼乐必有相应的制度兴作，当此之时，作育贤才和引导天下风气的国学，自然就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而在汉以来传统和儒经所载的国学体系中，“太学”实为绝对不可缺位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书学”独领风骚的局面就显得不那么合典应时，太学也就由此而成了北魏统一北方后兴学的重点，成了当时国学体制内、外二学并立局面中亟待加强的一翼。

常爽学馆的开立应在平定河西次年，也即太平真君元年（440年）以后，其生徒成份来源多端，胡汉混杂，元赞显然属拓跋宗室，司马真安、程灵虬则是汉人而家世不一，这样的状态与魏晋南北朝太学在习惯上兼收士庶子弟之况相当接近。对于神麴四年即已步入发展正轨的中书学而言，河西士人的到来不过是锦上添花，常爽学馆能使“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则在当时自应具有比中书学更为突出的代表性。如上所述，此时国学之中亟待振起者，唯有城东太学，这也是令人把常爽授徒与太学联系起来的重要一端。

《宋书·索虏传》载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2）十一月甲子下诏令太子拓跋晃总领庶政：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福祿，古今不易之令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时，飧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sup>①</sup>

诏书旨在通过太子监国体制确立拓跋晃的嗣君地位，此即所谓“万世之法”之要害。当然，其同时强调“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要求新旧交替，“更举贤良”，广开仕途，无疑也是在告诫太子持续推行大兴文教的政策<sup>②</sup>，为太平之治所宜制度奠定基调。“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则意味着后续的一系列政策制度。上节所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即是其中之一，是切实振兴太学的重大举措。《魏书·儒林传》序所述的“儒林转兴”之势，正由这种前后相继的制度安排所促成的，其背景又尤以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振兴文教的国策转折为要，其标志则是当时国学体制从中书学一枝独秀到与太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现在再看《常爽传》述其教学活动可以代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一语，则其所立并非私馆亦非中书学而属太学的性质，确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事实。

### 三、常爽学馆位置与城东太学相合

《常爽传》载其至平城“置馆温水之右”，此温水必在平城附近。温水的具体所指不但对确定常爽学馆的位置至关重要，更有助于说明常爽学馆的太学性质。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在论述太武帝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7—2338页。

<sup>②</sup> 拓跋晃用人倾向似偏于北族旧人，曾为此与尤重士族的崔浩在河北州郡人选上产生齟齬。参《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69页。太武帝此诏所强调的偃武修文，广启选才之路，则明显是要平衡新旧和胡汉人选。



尊儒崇学的一系列措施时,认为这里的“温水”是今珠江流域之南盘江<sup>①</sup>,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十二月“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条,胡三省注:“《水经注》:桑乾城西十里有温汤。”<sup>②</sup>似是以常爽置馆在桑乾城西温汤一带。温汤乃是温泉,且桑乾城去平城已远,《常爽传》所言“温水”不当在此。《后汉书·王霸传》也有关于温水的记载:“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sup>③</sup>李贤注曰:“《水经注》曰,温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益通以运漕也。”<sup>④</sup>则此水在蓟县与上谷之间。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湿余水》校证(一):《注疏》本杨守敬按:“王念孙曰‘灋’省作‘漂’,与济‘湿’之‘湿’相乱,因而讹为‘湿’,又讹而为‘温’。”<sup>⑤</sup>是“温”乃“湿”之讹。值得注意的是,此“温水”乃“温余水”之省称,“湿余水”之讹称。参考“湿余水”讹为“温水”之事,《常爽传》所述平城附近的“温水”极可能即是如浑水。《水经注·灋水》述如浑水:

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迳虎圈东……又迳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422)所城也。城西郭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延兴四年(474)立。其水又南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又南迳皇舅寺西……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论也。一水南迳白登山西……其水又迳宁先宫东……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水右有三层浮图,真容鸞架,悉皆石也。装制丽质,亦尽美善也。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486)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堂……是太和中之所建也。……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sup>⑥</sup>

“如浑水”与“温水”读音相近,盖指同一水,音译不同而已,《水经注》与《魏书》分取不同的读法。<sup>⑦</sup>“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一句历来难解,殷宪先生认为“自北苑南出”五字当移于“又南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前。<sup>⑧</sup>如此则如浑水自平城北宫一带,向南分为西、东二支:西支西出南屈入北苑,经虎圈东、平城西郭内,后屈经平城县故城南,又南经蓬台、皇舅寺、永宁浮图西,出郊郭而为一长塘曲池。东支南至白登山西,经宁先宫东,南至平城县故城东,再南经藉田,穿过药圃西和明堂东,远与武州川水汇流。如浑水西支为人工渠,现已湮塞难辨,东支即今天的御河主干。<sup>⑨</sup>那么常爽学馆是在如浑水的东支还是西支?据殷宪先生考证,平城西郭之东紧靠宫城,如浑水西支流入平城西郭内,与宫城西墙平行向南,至宫城西南角后绕折而东,至御路又南折流经平城南郭。<sup>⑩</sup>那么如浑水西支北段之右为宫城,不容常爽在此立馆。流至宫城西南角后转为东西走向,不存在“水右”的问题。随后在御路又南折进入南郭,南郭为居民密集的城南坊里<sup>⑪</sup>,似亦难以在此新立一大型学馆。且细味《常爽传》载其“置馆温水之右”,意似其馆本不在平城之内。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此“温水”应当不是如浑水

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黎虎主编)丁编《传记》第十七章《拓跋珪、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第二节《拓跋焘》中提到“河内温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220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第3877—3878页。

③《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737页。

④《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第738页。

⑤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一四《湿余水》,第352页。

⑥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一三《灋水》,第313—315页。

⑦秦蕙田在《五礼通考》卷二六《吉礼二六·明堂》中认为如浑水即温水。(光绪六年(1880)九月江苏书局重刊本,第1叶)

⑧参殷宪《〈水经注·灋水〉如浑水平城段部分文字整理》,《平城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5—102页。

⑨殷宪:《如浑水考》,《平城史稿》,第87—94页。

⑩参殷宪《北魏平城考述》,《平城史稿》,第40—49页。

⑪《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平城“郭城绕官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西支,常爽立馆的具体位置当在如浑水东支西岸一带,这是足以将之与《魏书·儒林传》所载“城东太学”相连考虑的重要线索。

《礼记正义》卷三六《学记第十八》“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条郑注:“谓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大学庠序之官。”<sup>①</sup>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学于城东,与中书省内的中书学遥相呼应,正是取鉴了儒经国子学在内、太学在外之义。非但如此,上引《水经注·灋水》所载“制如明堂”的大道坛庙,似乎起着类似明堂的作用<sup>②</sup>,其位置则在如浑水东支之左。大道坛庙建于太武帝始光二年(425),一年后再建城东太学,二者隔水相望,在太武帝心目中俱与太平之治深相关联,从汉魏以来太学、明堂、辟雍等文教建筑多相邻而建的用意来看<sup>③</sup>,城东太学与大道坛庙相隔不远,同处平城东郭以外,是完全合乎儒经所示及当时实际要求的。

对比《水经注》所载平城东西郊的建筑景观,西郊有与拓跋旧俗相关的建筑,诸如北苑、虎圈、郊天坛等。北苑和虎圈所在的鹿苑是北魏皇帝骑射狩猎的场所,太武帝更常于西郊治兵讲武<sup>④</sup>,西郊祭天坛壝则是北魏保留鲜卑传统最为典型和极为重要的设施<sup>⑤</sup>。崔浩主持修纂的《国记》也刊石立碑于西郊,其地正在平城通往郊天坛的道旁<sup>⑥</sup>,这是保存拓跋早期历史的重典,亦因代北各族高度关注而陡生波澜。由此看来,平城西郊可以说是北魏体现其北族传统最为重要的功能区。而东郊地区的建筑景观则多与华夏文化有关,例如大道坛庙、静轮宫、太学,以及后来续建的三层浮屠、明堂等。<sup>⑦</sup>大道坛庙和静轮宫由崔浩和寇谦之提议修建,二人欲综合儒、道“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sup>⑧</sup>，“制如明堂”的大道坛庙即为综合儒、道义旨的典范之作。城东太学则是复兴儒教和重建国学体制的重要设施,并与平城东郊其他体现华夏文化传统的建筑群相偕共生,由此出发考量前面所述常爽立馆绝非私学而属太学的性质,则其馆恰好位于“温水之右”的事实,就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为其从属于太学的判断提供了基本前提,且亦引人再思其与始光三年别建于城东的太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 四、从太学体制变迁看常爽“置馆”

《常爽传》述其“置馆温水之右”,易使人以其为一种私人行为,这应当就是今人将之视为私学的直接原因。但若考虑到十六国及南朝太学体制的变迁,则常爽立馆很有可能是北魏当时的太学亦已数馆并置的体现。

自西晋首开国子学与太学并立、高门与寒庶分流的国学格局,十六国时期的国学也呈现了多学并置之势,其况往往根据统治实际又附会儒经义旨,以解决不同氏族、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门类知识教学的特定需要,其中典型如后赵在襄国四门设立了十余所“小学”,大体负责“国人”子弟的教育,其“太学”则与“小学”相对而言而内涵错杂,又曾分别立有经学、律学、史学祭酒,又设专官教授国子击刺战射之法。这与前赵、前燕、前秦国学常分大、小学及东庠、西序等学的状态不无相通之处,其背后

①《礼记正义》卷三六《学记第十八》,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93页。

②参姜望来《崔浩所谓“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试释》,《唐研究》第1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2—143页。

③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④见《魏书》卷四《世祖纪》,第71、89、102、104页。

⑤参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五章《国家祭典的改革》,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65—178页。

⑥据《北史》卷二一《崔宏传》附《崔浩传》,《国记》石碑在“天郊东三里,方百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9页)。

⑦三层石浮屠为献文帝皇兴中所建,《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38页)其在如浑水东支西侧,与东侧的大道坛庙隔河相望。孝文帝所建明堂在平城南郊东部,如浑水流经其东侧,参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第26—34页。

⑧《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14页。

均有托附儒经适应胡汉关系格局和不同知识需求的用意<sup>①</sup>,故当时所谓“太学”,实已不能再以两汉魏晋其结构相对单一的状态来看待。北魏道武帝天兴定制,虽仿西晋而分立国子学、太学,但在天赐以来其制因胡汉矛盾尖锐而废弛<sup>②</sup>,到明元帝改立中书学和太武帝重建太学以来,太学的具体构成是否也像十六国时期那样结合儒经和现实要求而数馆并立,其可能性恐怕是难以排除的。更何况,南朝太学确在调整变迁中出现了诸馆并置的格局。太武帝平定河西的前一年,刘宋已将太学改为儒玄文史四馆并立的体制,这就为常爽“置馆”而仍属太学提供了样板和解释。《宋书·雷次宗传》载其精通三《礼》、《毛诗》,隐居不交世务:

元嘉十五年(438),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sup>③</sup>

元嘉十五年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南史·文帝纪》载此事则言宋文帝“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sup>④</sup>。《宋书·何尚之传》载帝以其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sup>⑤</sup>这自然不是由雷次宗、何尚之私人开馆授徒,何承天与谢元之“立学”也当如此。《魏书·常爽传》“置馆温水之右”的记载,正与《宋书》这里记四馆馆主之“开馆”、“立学”笔法相类。何尚之、何承天与谢元皆在朝为官而兼领学馆,其况亦与常爽为六品宣威将军而开馆授徒一致。故史载其“开馆”、“立学”,所体现的自然不是其馆兼具私人性质,而应是朝廷赋予其所任馆主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性的事实,是当时官学在办学方式上汲取私学特点的表现。至于上引《雷次宗传》特别点出其“时国子学未立”,似亦说明四馆性质近乎太学。<sup>⑥</sup>因而到元嘉十九年宋文帝下诏立国子学而四馆随即瓦解,也无非是再现了东晋以来国子学废多置少或仅备员,太学则因士庶相混而常不振的态势。<sup>⑦</sup>

顺便指出,宋文帝分置诸馆的做法,后来又为后代所取法,《南齐书·百官志》载:“泰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sup>⑧</sup>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分馆教学,科置学士十人,生徒应不在少数,相比于国子学,其性质自然更接近太学。至梁武帝时置《五经》博士开馆授徒,五馆各自别置,生徒为寒庶子弟,可经射策考试入仕,<sup>⑨</sup>虽无太学之名而有太学之实。五馆馆主常年居馆,以馆为家,生徒且或为之理丧,<sup>⑩</sup>馆主对其馆的管理和主导地位确已有所强化。

据以上对十六国、南朝国学体制多学并立之况的讨论,《魏书·常爽传》载其“立馆温水之右”,这种笔法显然很难视为其馆乃是私学的证据,倒是表明了太武帝重建和振兴太学的过程,存在着依本儒经和借鉴成例对其体制有所改造、丰富的极大可能,尽管今存文献对此并未留下其他记载,但常爽开馆倘如本文所论确属太学,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当时太学分经、分学或分馆教习体制的存在,并且同样突出了其主持者在教学和管理上相对于以往的较大权限。而这显然是合乎北魏国学体制以

①五胡政权多学并立之事,参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131页。

②何德章指出天赐年间诸汉化制度被鲜卑旧制代替,认为天兴太学遭到了废止,参《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38页。

③《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第2292—2294页。

④《南史》卷二《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页。

⑤《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第1734页。

⑥《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载其玄学馆生徒有“慕道来游”者(第1734页),可知四馆与限以贵贱的国子学不同,生徒来源必甚博杂。

⑦参《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第2346页;《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57—366页。并参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101页。

⑧《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第315—316页。

⑨参《南史》卷七一《儒林传序》,第1730页;《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24页。

⑩如严植之卒于学馆内,死后家无余财,“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焉”,参《梁书·严植之传》,第671页。



太学变动为最大的态势的,也是与十六国、南朝太学往往多馆并立的状况相呼应的。

在北魏一代汉化进程与保守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国学的曲折发展显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以上所述常爽学馆非私学而属太学诸事,即反映了其中若干重要的方面。当道武帝天赐年间国策偏向保守一侧,天兴时期强调汉化的相关制度纷纷废弛,由国子学和太学构成的国学体制应已瘫痪。道武帝死后,明元帝尝试对政策和制度做出某些调整,以期平衡道武帝前后期政策,在国学建制上则并未恢复国子学和太学,而是循五胡之例改立中书学,体现的也是一种折衷调和的选择。<sup>①</sup>这一举措在当时或难取得多少进展,却毕竟留下了北魏国学后续发展的基础。到太武帝登位后别建太学,至神䴥四年广征汉士而多任职中书博士,中书学的发展成为太武帝地位巩固后推进一系列汉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迨至凉州平定北方统一,太学又成太武帝大兴文教以谋远图的关注焦点,河西人士常爽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所立之馆应为城东太学的组成部分,其教学活动则与中书学索敞极相类似,均为北魏此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可用之才,且使儒学代表的政治、学术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常爽更在陈寅恪先生揭示的河西所存西晋以来文化因子的传播上起了重大作用。诚如《魏书·儒林传》所述,国学二学在当时的复兴实际上意味了“儒林转兴”,这对此后直至献文帝、孝文帝时期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典型如献文帝时倡建地方官学体系的李訢,即是太武帝朝的中书学生;<sup>②</sup>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冲,则为献文帝时的中书学生;<sup>③</sup>而常爽门下造就的元赞,至孝文帝迁都后已任职尚书左仆射参掌机要;<sup>④</sup>程灵虬则在孝文帝时参修国史,至宣武帝总结孝文帝改革成果再定律令时,又与议其事。<sup>⑤</sup>可以说,正是太武帝时期国学的发展,以常爽、索敞为代表的太学和中书学教学的卓越成效,构成了此后汉化与保守相持格局向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转化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蒋永华)

##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Changshuang School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HUA Yu, LOU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shuang School and Emperor Taiwu's policy to promote educatio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rguing that the school was essentially an imperial college rather than a private one. The clarification of Changshuang School's status can help us not only develop a whole pic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state school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als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official school system since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 words:** Changshuang School; Emperor Taiwu's promotion of education; state school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①中书学始自五胡,参严耀中《北魏中书学及其政治作用》,《魏晋南北朝史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6—208页。

②北魏州郡学之设,参《魏书》卷四六《李訢传》,第1040页。

③见《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79页。

④见《魏书》卷二一上《广陵王羽传》,第549—550页。

⑤见《魏书》卷六〇《程骏传》附《程灵虬传》,第1350页;其与修国史之事参同卷《韩显宗传》,第1342页;正始时与议律令,见《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36页。